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

瞿林东 主编

上卷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形成

瞿林东 张子侠 刘治立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重大项目

ZHONGGUO GUDAI LISHI LILUN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



瞿林东 主编

上卷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形成
瞿林东 张子侠 刘治文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瞿林东主编.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1

ISBN 978-7-212-04091-8

I. ①中… II. ①瞿… III. ①中国—古代史—研究 IV. ①K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7006 号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

(上、中、下卷)

瞿林东 主编

出版人:胡正义

责任编辑:秦 闯 曹文益 白 明 孙文波 装帧设计:钱志刚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

邮编:230071

营销部电话:0551-3533258 0551-3533292(传真)

制 版: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制: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94.75

字数:1300 千

版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12-04091-8

定价:296.00 元(共三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这部三卷本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阐述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从形成、发展到繁荣的历程。它从筹划、撰写到成书，历经了十五六个年头。回想起来，感触良多。

20世纪90年代中期，安徽人民出版社秦闯、曹文益两位先生与我联系，根据我对中国古代史学中一些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约我撰写一部这方面的书稿。1996年10月，我收到了他们代表出版社寄来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一书的约稿合同。于是我约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宋衍申教授和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许凌云教授作为合作者，筹划写一部三卷本的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专书，宋、许二教授都欣然同意。衍申教授长我一岁，我长凌云教授一岁，作为“同龄人”，我们对此事颇有信心。

为了给筹划工作迈出切实的第一步，我草拟了三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书稿的撰写大纲，并请宋、许二教授来北京就撰写大纲交换意见。在这次交换意见的过程中，除讨论学术问题外，我们都有一个愿望，即在我们60岁前后写出这部书，也算是我们为史学发展做了一点事情。此后，因研究经费没有着落，加之我们三人各自的教学、科研任务都很繁重，这件事情就搁置下来了。为此，我对安徽人民出版社总有一种歉疚之感。



2000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被教育部列为重点研究基地。2001年,“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作为研究基地的重大项目获得批准立项。这一转机,促使我再次同安徽人民出版社就此事取得联系。2002年,这一研究工作重新开始并真正起步了。课题组成员除我本人外,都是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大家就早先我草拟并作了某些修改的撰写大纲反复进行了讨论。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究竟哪些问题是我们必须首先关注的历史理论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在本书中的位置及其相互联系。其实,关于前一个问题,是我们在撰述过程中始终都在思考和探索的重点和难点。我曾经摸索着把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用“天人古今、时势理道”八个字加以概括,但是这一概括对于丰富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来说,一是难得做到全面,二是这种概括必须同具体的历史事实和相关的理论问题相结合,才有可能作出比较清晰的阐述。就本书现在的面貌来说,这只是提出了我们认为是重要的、同时也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并对它们作初步的研究和阐述。书中没有论到的问题,或因我们的识见所限,或因我们的学力所限,则有待来日作进一步的研究。

本书在撰写方法上,是于贯通中突出阶段性的特点:一方面力求反映历史发展的时代特点,一方面十分关注论题本身演变的特点。我们还考虑到这一撰述方法,也有益于横向反映某一历史阶段之历史理论发展的整体面貌。

本书是多人合作的产物,执笔人分工如下:

导论:瞿林东。上卷:第一、三章,刘治立;第二、四、五章,瞿林东;第六、七、八、九章,张子侠。中卷:第一、二、三、八、九章,瞿林东;第四、五、六、七章,李珍。下卷:第一、二、四章,江湄;第三、五、九章,罗炳良;第六、七章,徐国利;第八章,刘治立。全书由我负责总纂、统稿。马艳辉博士和博士生阎静同学协助我在电脑上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



我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比较关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研究,关于这方面的旨趣及研究所得,见于拙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 1994 年版,2000 年重印)、《中国简明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等,这里不再赘述。我以为,关于发掘、清理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历史理论遗产,是一件艰苦而有意义的研究任务,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本书的出版,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安徽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同志十分关注本书的撰写和出版,责任编辑秦闯、曹文益先生始终同我们密切配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和我的合作者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于本书存在的不足和不当之处以至于缺点、错误,祈请学术界朋友批评指正,这将有裨于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

瞿林东 谨识

2009 年 9 月 10 日





导 论

瞿林东

第一节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一 历史理论

历史学的理论,就其总体来说,是由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个部分组成。

历史理论研究的对象,同史学理论研究的对象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但二者又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是人们对于客观存在的历史运动的认识,后者是人们对于史学这门学问或学科的认识。^①关于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人们常常分辨不清,即使在史学工作者中,有些朋友也容易把它们混同起来。显然,这对历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的发
展是很不利的。这种情况近年虽已有一些变化,但从理论研究的发展和
要求来看,还是有许多工作要做的。

说到历史理论,我们首先要提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点,这对我们理解历史理论的概念及其内涵,有重要的启示。恩格斯

^① 陈启能:《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1986年12月3日《光明日报》;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在 1885 年 4 月 23 日致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这样写道：

……首先，我再对您说一遍，得知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人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点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我感到自豪。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将会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①

恩格斯在这里说的“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同他在两年前即 1883 年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说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两大发现，应是一致的。值得关注的是，恩格斯特别强调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只有同“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其作用。恩格斯的这个思想，在中国史学界克服了教条主义的影响和经过拨乱反正的洗礼之后，对人们的启迪无疑是十分深刻的。

再看列宁的有关论说。列宁在解释马克思的历史观时写道：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

^① 《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1885 年 4 月 23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69 页。





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作这些关系的根源;第二,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零星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所有各种矛盾的趋向的**总和**,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准确测定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的条件,排除了选择某种“主导”思想或解释这种思想时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不同趋向的**根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群众的动机是由什么决定的,各种矛盾的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是由什么引起的,一切人类社会中有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是怎样的,构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是怎样的,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是怎样的,——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且指出了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的途径。^①

在这里,列宁首先批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进而论述了马克思研究历史的途径和方法,从而也就更加清晰地说明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精义及其运用,以及在实际运用中应

^①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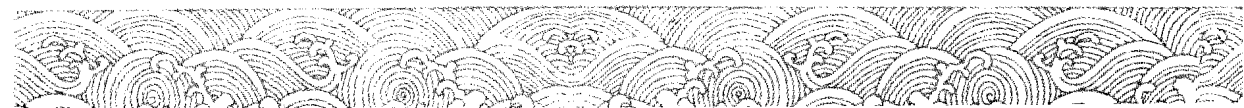
当着重考察历史或社会的哪些方面等等。这样，人们不仅可以据此判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同以往历史理论的根本区别，而且也可以据此了解应当从何处着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来分析历史和社会。

此外，还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即列宁的这段论述是从批评“以往的历史理论”开始的，这就表明，“历史理论”作为人们认识客观存在的历史运动的一种理论形式，也是有它的发展的历程的。因此，第一，从历史学领域的研究来说，考察这个发展的历程是十分必要的。第二，根据恩格斯的看法，对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应当同“本国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相结合，才是正确的做法。

在中国，李大钊根据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提出了历史理论的具体对象。1924年，李大钊在其所著《史学要论》一书中，把“历史学”划分为“记述的历史”和“历史理论”两个方面，前者包含个人史（传记）、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后者包含个人经历论（比较传记学）、氏族经历论、社会集团经历论、国民经历论、民族经历论、人类经历论。李大钊说的“记述的历史”，重在叙述客观存在的历史运动，重点在反映“事实”；而“历史理论”则重在“对‘事实’的‘解释与说明’”，重点在探讨“理法”。关于二者的关系，他这样写道：

记述历史与历史理论，其考察方法虽不相同；而其所研究的对象，原非异物。故历史理论适应记述史的个人史，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亦分为个人经历论，氏族经历论，社团经历论，国民经历论，民族经历论，人类经历论等。^①

^① 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6页。





这里指出了历史理论的研究对象,同记述历史的对象有相互联系之处,故前者的研究内容大致也可以同记述历史的研究内容相配合,所不同的是,一则以“史”叙述,一则以“论”阐发。李大钊还强调指出,不论是“史”的研究,还是“论”的研究,其研究对象的某一部分与其他部分都是有联系的,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才把它们加以区别,而在研究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各个部分的联系。至于记述历史同历史理论之间的关系,还有更进一层的意义,那就是:

记述历史与历史理论,有相辅相助的密切关系,其一的发达进步,于其他的发达进步上有莫大的裨益,莫大的影响。历史理论的系统如能成立,则就个个情形均能据一定的理法以为解释与说明,必能供给记述历史以不可缺的知识,使记述历史愈能成为科学的记述;反之,记述历史的研究果能愈益精确,必能供给历史理论以确实的基础,可以依据的材料,历史理论亦必因之而能愈有进步。二者共进,同臻于健全发达的地步,史学系统才能说是完成。^①

按李大钊的说法,只有记述历史同历史理论都有相当的发展,历史学才是“健全发达”的,历史学的学科体系才能建立起来。同时,他还给了我们另一个启发,即历史理论的研究不可能脱离对于具体的历史过程的认识。这个启示,对于我们认识以往的历史理论和发展今天的历史理论,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那么,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史学家们是怎样把握上述有关历史理论的对象和内容的呢?当然,这主要是指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言。这里,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翦伯赞在1938年出版的《历史哲学教

^① 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7页。





程》一书。作者在这本书中着重论述了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阶段性和规律性,阐述了历史发展中的种种矛盾以及客观条件与主观努力的关系,阐述了人们对历史发展动因的种种认识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还阐述了群众、领袖在历史运动中的作用等。^①作者在此书的序文中讲到了撰写本书的宗旨和目的,他写道:

现在,我们的民族抗战,已经把中国历史推到崭新的时代,中华民族已经站在世界史的前锋,充任了世界史转化的动力。为了争取这一伟大的历史胜利,我们认为决不应使理论的发展,落在实践的后面;反之,我们认为,必须要以正确的活的历史原理,作为这一伟大斗争的指导,使主观的努力与客观情势的发展,相互适应。^②

毋庸置疑,作者所说的“历史原理”,当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基本原理。同时,作者在这篇序文中一再强调,对于一些“错误的历史理论”应予以“彻底澄清”。1939年,作者在《群众、领袖与历史(再版代序)》一文中进一步指出:

现在,我们在唯物史观的历史家的著述中看不见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就正像我们在旧的历史著述中看不见“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痕迹一样。忽略历史客观发展的规律,是史的观念论者的一贯作风;忽略历史主观创造的作用,也不是辩证唯物论者的历史理论。辩证唯物论者与观

^①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②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念论者及机械论者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仅同时注意历史之主观创造作用与其客观发展的规律,并且尤其注意它们在历史运动中之辩证的统一。^①

从这里可以看出,翦伯赞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不论是批评某种史学现象,还是从正面阐述自己的见解,都表明他对“历史理论”的高度重视。联想到作者在20世纪60年代所发表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到作者在这方面的思想脉络和对“历史原则”、“历史理论”的具体运用。^②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师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第1册,在其叙篇中提出了“历史理论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理论二:物质生产和物质生产者的历史”、“历史理论三:社会历史之辩证的发展及其规律性”,并一一予以论述。^③其后,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第1卷即导论卷中,则有对“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历史的客观性和可知性”、“历史理论的探索”等问题的论述,而这些论述都是同认识中国历史相结合的。^④

综上,可以看出,历史理论大致包含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这是具有指导性的层面,或者说是普遍性的层面;另一个层面是历史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这是反映实践性的层面,或者说是特殊性的层面。一般说来,这两个层面是密切相关的,前者是后者的指导原则,后者是前者的具体表现。

这里,我们要说几句有关本题以外的话,而对学科来说却又是题

①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② 翦伯赞:《翦伯赞史学论集》第3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③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9页。

④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中应有之义的话。即当今史学界流行着一个明显的误解或误读,那就是往往把“历史理论”说成是“史学理论”,或者是用各种表述方法,使“史学理论”把“历史理论”包含进去。我们认为,这样做不仅造成概念上的混乱,而且直接妨碍研究的深入。因此,我们应当把“历史理论”的本义和名称还给历史理论,同时也可以使“史学理论”的内涵变得清晰起来。近年,何兆武主编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一书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①

以上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及其运用的初步认识。我们试图以这一认识为指导,反观中国古代史学的历史理论,即把“人体解剖”运用于“猴体解剖”,希望能够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二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产生以前的历史理论的一种形式,它是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和史学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因此,它所涉及的许多问题无疑都带着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特点,其中有些问题也具有普遍的意义。

中国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史学家们在历史观点、历史思想方面有丰富的积累,也有一些史学家的历史思想形成了他们所处时代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和理论体系。这个认识水平和理论体系因时代而异,因而是变动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从司马迁、班固到杜佑,从司马光、郑樵到王夫之,其发展的轨迹清晰可见。还有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关于历史的见解、评论,其中包含着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历史观点、历史思想,也可以丰富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认识。

^① 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0世纪60年代初,白寿彝在《谈史学遗产》这篇名作中指出:

分析批判各种不同的历史观,这是我们研究史学遗产时首先要担当起来的重要的工作。当然,过去无论哪一种历史观都不可能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相比。但分析批判形形色色的历史观,对于掌握历史理论的发展规律,锻炼我们的识别能力,丰富我们的理论,提高我们的水平,都是不可少的。^①

这里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对各种各样的历史观进行分析,给予恰当的评论;二是这种研究过程有利于研究者“掌握历史理论的发展规律”。是否可以认为:前一个方面是可以不断得到一些具体的结论,后一个方面则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提升过程。作者在这篇论文中还提出了三个值得关注的具体问题:一是“人定胜天说跟命定说间的斗争”,二是“时势创造历史说跟英雄创造历史说的斗争”,三是“历史进化说跟是古非今和历史循环说的斗争”。^②作者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概括性的阐述,从而指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起来的。

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再一次论说史学遗产,他在讲到历史观点时,发挥了他在20年前所阐述的见解,指出:

多年以来我们有个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以前,历史观点都是历史唯心论,好像是一无可取。前几年,我们在中华

^① 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2~473页。

^② 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9页。





书局搞“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每一部史书在出版的时候，照例要写篇出版说明。在出版说明里，总要说说为什么要出这部书，首先就要说说历史观点。这差不多都要指出来作者的思想是英雄史观，是以帝王将相为历史的创造者，是诬蔑农民起义和劳动人民，是历史唯心论。这就是说，作者的历史观点是不足取的。但是，为什么要出版这部书呢？出版说明的笔锋一转，接着就说，这部书在史料上如何有价值。这种写法差不多成为出版说明的一般公式。按照这种写法，“二十四史”只能是二十四部史料书，再没有其他的价值了。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二十四史”，固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还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思想资料，留下了观察历史的方法，留下了写历史的方法，留下了许多专门知识。从历史观点来说，在“二十四史”里，在别的很多史书里，在不少有关史事论述的书里，都还是有进步的观点、正确的观点，可以供我们参考、吸取和发扬的。^①

这段话包含了对学术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的反思和总结，其核心所在是说明对史学遗产中的思想遗产，应当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去总结，用辩证的观点去分析，而不是简单地看待。

白寿彝以其在史学遗产方面的渊博学识和对于中国史学中的历史观点、历史思想、历史理论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发展的辩证法则的深刻理解，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一再提出并强调要加强对历史观的研究。1983年，他在一次学术讲演中又一次阐述了他的一贯的见解，他说：

^① 白寿彝：《关于〈谈史学遗产〉——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95~496页。





关于中国史学遗产,我看有好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个,中国历代的史学家、历代的思想家,有不少的人都有他们的历史思想、历史观点。……马克思主义没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历史学不可能有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过去没有正确的历史观点。对具体历史问题、具体历史现象、具体历史人物、具体历史事件,过去也曾经有过不同程度的正确看法,这些看法不可能都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里面,但是它们是正确的。在今天我们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了,对于这些前人所做的成果,我们不要一脚踢开,应该吸收过来做我们的营养。^①

“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体系,这个科学的思想体系是它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并提升了人类思想的积极成果而创造出来的,它不同于在它出现之前的任何思想体系,但又并非同以往的思想体系毫无联系,这就是人类思想发展历程的辩证法则。白寿彝本着他的这种信念,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史学上也曾有过正确的思想,这些正确的思想还可以吸收过来作为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提高自身理论水平的“营养”。正因为如此,他讨论史学遗产问题并不只是停留在学理上,而是进一步落实到史学活动的实践层面,使史学遗产在当今的史学发展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① 白寿彝:《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1983年4月6日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讲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1页。

